

辛亥革命史丛刊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5辑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史丛刊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5辑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15辑/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216 - 07399 - 8

I. 辛…

II. ①辛…②武…

III. 辛亥革命—研究—丛刊

IV. K257.07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74 号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15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76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399 - 8

定价:4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何去何从:晚清国人的道路选择

——以五大臣出洋为中心的考察…………… 陈 丹(1)

试析清廷筹备立宪活动中的满汉关系

——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中心…………… 张 超(17)

辛亥革命前后汉口人的市民自治与社会参与…………… 汤 黎(43)

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妇女抗争…………… 邵 雍(54)

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考辨…………… 王兴科(70)

民国第一任内阁执政短暂原因探析…………… 高 路(91)

“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

繁荣的原因探析…………… 赵国壮(108)

民族主义与南洋劝业会…………… 洪振强(127)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述论…………… 贾孔会(146)

辛亥革命期间盛宣怀“保护”汉冶萍公司的策略…………… 左世元(161)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营工业的勃兴

——以湖北为例…………… 徐凯希(175)

辛亥后浙江蚕丝工副业的嬗变…………… 余 涛(192)

孙中山的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李本义 汤秀菊(203)

孙中山辛亥革命前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来龙去脉

…………… 张笃勤(222)

杀人与革命

——辛亥武昌首义“排满”细节考…………… 黄岭峻(242)

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 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及认识…………… 李学桃(265)

孙中山与梁启超辛亥革命论的比较…………… 郭 辉(281)

《独立周报》:“甲寅派”的起点 …………… 李 日 郭春香(299)

理想与现实

——孙中山《建国方略》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 李百浩 王玉霞(317)

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评价及其特点…………… 潘洪钢 林国章(341)

革命纪念与辛亥记忆:南方政府主导下的国庆纪念

——以《广州民国日报》为中心…………… 董恩强(371)

台湾两蒋时代的孙中山诞辰纪念…………… 周 游(393)

“袁世凯与清末宪政改革”研究综述…………… 谢未渊(409)

我的回忆

居钟明志遗著…………… (422)

何去何从：晚清国人的道路选择^①

——以五大臣出洋为中心的考察

陈 丹

1905年7月，清政府颁布上谕，派五位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此后，清政府逐步准备立宪。考察大臣回国后，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晚清政府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攻坚阶段。

五位大臣的考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开锣号，预示着中国立宪改革时代的到来。然而这个活动中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在响，整个的活动都折射着当时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选择。

一、明争：震惊世界的爆炸声

《泰晤士报》是一份影响世界的报纸，它对于中国的情形多有关注。1905年的下半年，吸引该报记者眼球的是日本和俄国的后续谈判、美国的排华以及中国的抵制美货。对于当时中央政府正在积极谋划的活动，该报有所关注，那就是在7月22日登载了来自东京的报道：中国政府宣布派使团出洋考察，日本媒体十分欣赏这一举措，并认为它是模仿了明治时代改革；它标志着中国真正改革时代的到来。虽然有这样的评价，此后的《泰晤士报》对于该使团的报道几乎归于沉寂^②，关注的焦点仍旧转移到了抵制美货上。

①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HUST：编号2012WQN0021。

② 《泰晤士报》在1905年8月30日又刊登了一篇关于使团的报道，介绍了使团的出访目的及出访路线。Proposed parliament for the China, *The Times*, August 30, 1905.

9月25日题为《北京的炸弹暴乱》的文章又重新将人们的眼球吸引回来,此文章是9月24日从北京发来的。文章说:“北京火车站今天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炸弹暴行(outrage)。当改革使团正要出发的时候,在他们的私人车厢中发生了爆炸。绍英(Shu)受伤严重,其他七个人受伤程度不等。伍廷芳受轻伤。凶手在车内被炸得粉碎。”在这篇文章之后,报章紧接着对“中国改革使团”作了基本介绍,文章说,“中国改革使团将要访问日本、欧洲和美国,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世界各国宪政。上个月发布了皇太后将在新年颁布以12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的谕旨,使团的任务就是为这个重大的宪政变革铺平道路。这个使团由满族亲王载泽带领,成员包括兵部侍郎绍英(此人受伤)、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及前两江总督端方。”^①9月26日,出现了另外一篇关于炸弹事件的报道,题为《北京的炸弹爆炸》,小标题上写着24人死伤。^②同一天的专题报道(Leading Articles)一栏中出现了题为《中国和改革》的文章。“中国幅员这么广大,政治管理这么松散,以至于国家生活的激进式聚合以及整体性重组,不会像一个人脱下一件衣服换上另外一件那样简单地完成。这种变化最终只能经过缓慢的也许是痛苦的过程才能到来,今天为12年后做准备的使团的出发以及同时发生的反对派的炸弹就是痛苦过程的一个暗示以及一种表现。”^③由于《泰晤士报》在当时的影响力,这几天连续登载的几篇报道无疑让全世界的人们了解到了东方正在发生的血与火的斗争。

实际上,这次暗杀事件,不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让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国内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该事件。根据这些报道,这件事情的大概情况也为人们所知晓。

① Bomb Outrage in Peking, *The Times*, September 25, 1905.

② The Bomb Explosion in Peking, *The Times*, September 26, 1905.

③ China and Reform, *The Times*, September 26, 1905.

9月24日，考察使团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出发。送行的人非常多，场面也很热闹。当时有外务部、商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等都已经先到迎候，还有许多学校的学生穿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及消防队早就到车站列队维持秩序，但外城的巡捕并未到车站。这天特地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不一会，各国驻京公使也来送行。等到开车铃响，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过了3分钟不见有其他异状，于是才有人前往察看，只见车门被炸裂，因此得知炸弹应该是从车中爆炸，然而载泽等各考察政治大臣还在车中。在场各人的伤势情况如下：载泽面部受微伤，黄马褂被溅血迹；绍英受伤较重，其他大臣受微伤和惊吓。车中炸死一人，车外炸死两人。另外萨荫图一家受伤最为惨烈。受伤者立刻被送往医院医治。^①

事后得知，此次爆炸是一位叫做吴樾的革命党所为，他在自己的《暗杀时代》一书中道出了此举的目的：“予于是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而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布其种子者……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此日正其时矣，吾愿为同志诸君之革命先鞭，吾更愿同志诸君之日继我后。”^②吴樾的刺杀，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革命党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以牺牲生命的极端行为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此时存在两种救亡道路，且两种道路之间存在紧张的争斗关系。

事件发生后，各地纷纷给受伤的使团发来慰问电。上海商界致商部电：“商部左堂唐转各钦宪，盼节方殷，阅报震骇，众情悬系，

① 《详纪出洋大臣火车被炸情形》，《大公报》1905年9月25日；《详纪五大臣火车被炸情形》，《申报》1905年10月1日。

②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

公电请安,严信厚等公叩”。江苏学会致端钦使电:“北京端钦差转各钦差,立宪关国家大计,使节受惊,同殷悬念。”各学会致外部电:“外务部王爷大臣钧鉴,闻考察政治五钦使受惊,同声震念,谨电请安,上海沪学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群学会等公叩”。各学堂致北洋电:“天津袁宫保转钦派考察政治五大臣钧鉴,闻使节受惊不胜瞻系,谨电请安,上海高等实业龙门师范复旦南洋中学等三十二校公叩沁”。^①《时报》馆、《南方报》馆以及《申报》馆也发电慰问五位大臣。驻北京各公使也发电慰问各出使大臣。对于各地发来的慰问电,五大臣分别予以回复。^②

报章对此事也多有评说。《大公报》登载《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作者说:五位大臣出发之日,就是“我中国转弱为强之日”,而以炸弹刺杀“真出乎人情之外而莫能索解者矣”。文章说,“尝闻之革命党因朝廷近来锐意变法,颇欲振兴,宪政将行,人心归向,此后革命党之势将不能取胜”,故而破坏此次出洋活动。“说者谓此事于新政生莫大之阻力,殆非佳朕,吾以为不然”,作者认为,革命党所期望的就是“朝政腐败,人心涣离”,因而政府应该“迎其机而速行改革”,“宣布立宪以固其内力,剪发易服以改其外观,当兴者兴,当革者革,急行其志,无俟躊躇”。^③《申报》刊登《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文章指出:当刺杀事件发生时,全国震动,大家以此为新政之阻力,但是作者说“不但无虞其生阻力,且将因是以促新政之速行焉”。^④《新闻报》登载《论车站炸弹》,文章说,正人君子不做暗杀这样的行为,但是“有时亦有迫压抑塞,无可解释,不得不置身命罪恶于度外,奋然一击以除世害者,论者原心略迹,尚予

① 《汇记沪上各团体发电慰问五大臣受惊电》,《时报》1905年9月26日。

② 《出洋五大臣致谢上海各学校慰问电文》,《时报》1905年9月28日。

③ 《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大公报》1905年9月26日。

④ 《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申报》1905年9月28日。

以任侠之名”，但是“若其所为者私而非公，则是全国命脉可以悬于是非不明喜怒不测者之手，人人惊惧，即人人唾骂，孰能谅之”；文章用“最初”、“最险”、“最奇”来形容此次暗杀，并建议“想朝廷断不以此稍挫其更新之气也。”^①《天津日日新闻》登载《论五大臣遇险》，作者认为行刺的结果是“只伤其二余无恙”，故而是“不幸中之幸”。^② 这些文章大多从支持政府改革的角度来评价此事，他们谴责刺杀行为，鼓励考察政治大臣不要受到事件的影响而坚持出洋考察。

当然，舆论当中也有支持刺杀的。湖北《楚报》登载的一篇报道“系论五大臣出洋被轰事”^③，“措辞奇离，崇拜匪人”^④，其作者因此而被捕。从这个事情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言论控制。在国内出版的报刊中，很少出现赞扬刺杀行为的言论，言论控制必然是原因之一。在国外出版的报刊中，还是可以见到支持刺杀的言论的。《民报》就登载了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对吴樾的刺杀事件做出了评价。他将五大臣称为“满奴”，继而将其比喻为“魔鬼”，将吴樾称为“烈士”，其对于矛盾双方的定位与以上各篇文章完全不一样。文章说，国人对于“满奴”的不死应该表示惋惜，对于“烈士”的殉国应该举行追悼会。而国人的反应，“何其颠倒如是其甚也！”作者认为吴樾的举动非常勇敢，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故而应该表扬而不是斥责和辱骂；而五大臣出洋是清政府愚弄汉人的手段，是“狞鬼执粉笔以涂人皮”的举动，“烈士”击杀“魔鬼”，“不幸而为魔鬼所毙”，但是国人反应却是“痛

① 《论车站炸弹》，《新闻报》1905年9月27日。

② 《论五大臣遇险》，《天津日日新闻》1905年9月26日。

③ 《报馆主笔被拘》，《华字汇报》1905年10月21日。

④ 《楚报记者收禁府监》，《华字汇报》1905年10月27日。

恶烈士”而“慰问满奴”，这是“病狂丧心”的举动。^①《民报》的这篇文章谴责了国人对于吴樾刺杀事件的态度，而这种谴责说明了当时国人中之多数还是倾向于支持清政府派大臣出洋考察这种改革行为，对吴樾的刺杀行为反而持斥责和辱骂态度。可以说，支持五大臣出洋是当时国内舆论的主流。这也是国内极少出现支持刺杀事件言论的原因之一。

二、潜流：使团中的异志者

刺杀事件发生后，北京城人心惶惶，刺客的身份也渐渐浮出水面。但他的暗杀之所以能够如此精确的发生，与此次出洋使团中的随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随员之一，杨守仁，原名毓麟，字笃生。被当时人称之为“文豪”，有人曾评价：“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②他于1902年东渡日本，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本，其思想逐渐转向革命，曾与黄兴等共同创办《游学译编》杂志，写作并出版《新湖南》。1903年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后又参加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为江南一带的“运动员”，负责筹备经费与联络同志。为模仿俄国“无政府党”从事暗杀的做法，他与苏鹏等在横滨秘密设立了炸药制造所，学制炸药，“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③。1904年赴上海，10月设立爱国协会（华兴会的外围组织），被推为会长。后为躲避清政府的缉捕，改名杨守仁，赴北京，任译学馆教员，计划从事“中央革命”。不久赴保定与吴樾等共同组织北方暗杀团，即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1905年清政府准备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消息传出后，与吴樾策划对他们施以暗杀。杨笃生先

① 《民报》，第1号，第108～110页。

② 《吊杨笃生文》，《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③ 《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卷，第117页。

谋得载泽随员职务，以为内应。9月24日，吴樾暗杀事件后，杨笃生并没有受到怀疑，随载泽使团至日本。^①

从杨守仁的基本情况看，他与吴樾刺杀案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其一，杨守仁和吴樾早就相识，他曾经组织北方暗杀团，着眼于刺杀清政府大员，吴樾为重要成员。其二，他为吴樾提供炸药。杨守仁被称为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炸弹的第一人，^②吴樾本打算用手枪刺杀，而杨守仁建议他用炸药威力更大。其三，他为吴樾提供五大臣具体行程。当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的消息传出，杨谋得载泽随员职务，以便为吴樾提供内应。他加入考察团，就是为刺杀服务的。其四，刺杀事件发生后，杨守仁没有受到怀疑，顺便随着使团到达日本。

此外，随员中还有两人需要特别指出来：王慕陶、戢翼翬。

王慕陶，原名志渊，字侃叔，别字佩叔，湖北宜昌城区人。早年曾游学上海，结识了一些维新革命志士。后随父执陶在宽到日、法、德、英、美等国考察学术政治。1900年，回国随即到武汉，因涉嫌“唐才常党案”被囚禁于江夏狱中，一年后方昭雪得释，居上海编辑书报。1902年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王慕陶担任干事，为会中激进派成员。^③1905年李盛铎奉命与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招王慕陶为随员。

戢翼翬，字元丞，湖北房县城关人。于1896年3月被清政府作为首批官费生派赴日本留学，系鄂省留日第一人。1899年孙中山到达东京，戢与沈翔云、吴禄贞往访，共谋治国方略，深得孙中山

① 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2134页；《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78年，第2册，第53页。

② 郑逸梅：《前尘旧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③ 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赞赏,吸收为兴中会员。1900年春,吴禄贞、刘成禺在留学界中发起组织励志学会,戢任该会干事。7月回国,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事泄,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遇害,戢亡命日本。12月,与杨廷栋等创办《译书汇编》月刊,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宣传民主思想,被称为留学界杂志之先祖。1901年5月,与杨廷栋、杨荫杭、王宠惠等于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鼓吹民族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指名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保皇谬论,呼吁国人反清排满,改革中国政治,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孙中山为支持该报出版,曾以千元相赠。戢与沈翔云还以该报事务所为活动机关,组织“国民会”,积极主张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开展革命运动。8月,《国民报》因经费缺乏停刊,“国民会”亦随之解散。1902年春到上海,参加蔡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被举为干事。后在孙中山支持下,与友人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合作,集资在上海创设“作新社”,并设图书局、印刷局,编印出版《东语正规》、《万国历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等书籍,帮助国人学习日文,了解世界形势,揭露沙皇俄国蚕食东方之阴谋。12月,邀秦力山、杨廷栋、雷奋、陈冷等人在作新社内创办《大陆》月刊,主张改革政治,批驳保皇邪说,坚持出版达三年之久,广泛接纳革命党人,成为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物。1905年7月,清廷首次考试留洋毕业生,戢获赐政治经济科进士出身,分发外务部任主事,暗中从事革命。同年冬,随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①

从王和戢的经历来看,在参与中国教育会时这两人已经认识,且都面见过孙中山,甚至与孙关系密切。1904年黄兴曾召集杨守仁和王慕陶等一起开会^②,故而杨、王在出洋前也已经相识。三人

^① 《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980页;《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②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在参与考察事务之前，在革命党中都有一定地位，并有实际的革命行动。到达日本之后，杨守仁和王慕陶曾拜访当时主持《民报》事务的宋教仁，“谈良久出”。^① 戢翼翬到达日本后，也见到了宋教仁，且与宋教仁志趣相投，“共研西方政治，交往甚密”。^②

问题在于，这三位革命者如何被纳入到为清政府改革服务的考察政治使团之中呢？这三人都属于载泽所带领的一队考察团。在这一队所要考察的国家中，日本是重点之一，所以十分需要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人员。这三人都曾留学日本，且学问突出：杨守仁的文笔非常好，当时与杨度齐名^③，曾获得学部大臣张百熙的保荐，并受到军机大臣瞿鸿禨的赏识；戢翼翬则获赐政治经济科进士出身。同时，正是因为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结下不解之缘。同样是革命人士，杨守仁行为激烈，协助吴樾暗杀以阻止五大臣的考察。而王慕陶和戢翼翬则跟随使团一起考察世界。

三、暗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吴樾的刺杀，对出洋考察使团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这个或许要以生命为赌注的游戏，有些人选择了退出。但全国舆论沸腾，希望考察政治大臣们能早点启程，从而开启中国改革的新局面。使团的再次启程比前一次要谨慎得多。五位大臣分开出发，行动非常秘密，没有那么盛大的送行场面，出行日期也予以保密。各地迎接时，

①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65～566页。

② 《湖北人物传记》（试写本），湖北省志·人物志编写室编，湖北省武昌县印刷厂印刷，1983年，第9页。

③ 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文中提到：“笃生尝与杨度同受业于王壬秋之门。在门弟子中最著名，号二杨。”

保卫工作也很严密。大臣们也似乎特别注意安全问题，端方等到达上海时，没有登岸，而且只让沪道一人来拜访，也不许带随员。

同时，在整个考察活动中，考察团始终保持戒备，预防革命党人袭击。被访问的国家也由此认识到革命党对这些大臣存在威胁。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势力很大。于是当载泽等人到日本访问时，就载泽一行到达日本后的警备问题，内务省向各地相关部门下达了以下训令：“……据清朝当前局势，趁大臣等出发之时意欲加害之人有之，且正值我国国内清朝留学生的骚乱尚未完全绝迹之时，此刻在日清朝人及其他人对（载泽）一行万一有不法行为，鉴于情况不简单，请在警备等各方面上予以留意，载泽一行在贵部管辖范围内停留或通过之时，请采取周全的警戒措施，并与前进地方相互通气等等……”^①日本政府为了保证考察政治大臣们的安全，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居于日本的革命人士予以严密监视就是其中之一。宋教仁在其日记中写道：“是日日政府派有巡查三人守《民报》社，云因载泽来东，防掣革命党甚严密，故出此手段，并言余等出门亦尾之于后云。”宋教仁认为，日本政府这样的举动，“亦太小心矣，不禁可笑”。宋教仁其后外出，发现“一巡查果随余后，申初回，彼亦随来，是日余遂不出门矣”。^②随后几天，宋教仁发现《民报》报社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报社人员出门，均有警察尾随。宋教仁的记录，展现了当时日本政府严密防范革命党人的情况。端方、戴鸿慈到达美国时，美方还给他们配有贴身保镖。

当然，在各大臣出洋访问的过程中，危险情况还是出现过的。例如，在新加坡，“登岸时闻有枪声，疑系有人施放，后经搜查，踪迹全无，

① 参照《政务一件》所收，内务大臣《训令一六号》，转引自孙安石：《光绪新政期，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日本訪問》，《歴史学研究》，第685卷，1996年第6期，第41页。

②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第566～568页。

外人不知，遂传为又遇炸弹云”。^①但是这一路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原因很多，考察过程中各方警戒的加强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方面来说，这次刺杀事件给大臣出洋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除了被动地防备革命派人士的袭击，考察大臣还主动地与她们进行争斗。一方面，在外国进行考察时以良好的形象显示清政府锐意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这些大臣还采取了一种与革命派争斗的有效方式——争取在外国的华人支持。这些华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当地学习的留学生；另一类是在当地工作或从事贸易等活动的华侨。使团在考察的过程中与留学生以及华侨都有很多接触。五大臣是以清政府特派使臣出洋考察的，他们代表着清政府。他们与留学生及华侨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用他们的影响来吸引这些人以使其倾向于清政府，从而消弭革命势力对于这些人的影响。

在考察的过程中，考察政治大臣有许多到留学生所在学校参观的项目。在参观的过程中，考察政治大臣或者赠与留学生以一定数额的钱作为学费。例如，戴、端一行在日本参观“同文学校”时，戴、端二人“赠以学费五百元，且以三十元为冬季奖赏焉”；^②后来在参观大同学校时，戴、端二人又“助以学费五百元，并奖生徒书物费五十元，女生五十元，幼稚园生三十元”。^③这些资金一方面对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也是考察政治大臣拉拢留学生的表现。考察政治大臣还通过发表演说影响留学生。例如在德国的柏林学会对留学生发表演说，据《民报》记载，留学生中“有称是者”，也有“默然去者”。^④《民报》记载中尚且说留学生

① 《考政大臣遇险纪实》，《大公报》1906年7月29日。

②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326页。

③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331页。

④ 《民报》，第7号，时评，第1页。

中有点头称是的人,那么可见考察政治大臣的演说对于留学生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在考察中,五大臣使用了许多留学生为其考察服务,这些留学生对于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出洋之前,清政府曾令五大臣在考察过程中留心延揽人才:“政府与出洋五大臣会议,以此次考察各国政治,必须留意延揽人才。所有现在西洋之留学生,可择其品学兼优者,酌带回国以备将来襄办一切新政之用。”^①对于考察过程中遇到的优秀人才,考察政治大臣向清政府予以推荐。据报道,“考察政治端戴二大臣有电来京,奏保留学西洋毕业生数人,并曾充外国领事之商人一员,均请带同回国,破格录用,政府亦意在照允云。”^②清政府和考察政治大臣留意于西洋人才,一方面是清政府的确需要有西洋留学背景的人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政府防范革命者的用心。此时东洋留学生受到革命势力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为了防止西洋留学生也受到革命势力影响,清政府采取拉拢西洋留学生的策略。

华侨是五大臣在海外遇到的最大的华人群体。这个群体是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也是清政府争取的对象。五大臣在出洋的过程中,通过与华侨的接触来极力吸引这些人,拉拢他们以支持国内的改革。一方面,考察政治大臣向华侨表示朝廷惦念海外的侨民。另一方面,当时的华侨当中有许多人十分期望清政府实行立宪政体,而五大臣就以立宪为辞来吸引华侨。例如,在日本时,戴、端两大臣到中华会馆进行演说,“措辞皆以立宪为宗旨,听者约二百余人,无不鼓掌欢迎。盖海外华商之望立宪久矣,以此立说宜其感动奋发于不自知。”^③考察政治大臣演说中以立宪为宗旨,华侨故而

① 《政府注意西洋留学生》,《申报》1905年12月9日。

② 《端戴二大臣奏保人才》,《南方报》1906年7月6日。

③ 蔡琦:《随使随笔》,第3页,国家图书馆藏。